

引文格式: 罗迪江. 生态翻译学视域下的绿色翻译探析 [J]. 常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 22(4): 88-96.

生态翻译学视域下的绿色翻译探析

罗迪江

摘要: 绿色翻译是将普遍存在于生态翻译中的绿色方法与绿色理念相结合的一种生态翻译实践表征形式,其本质是基于生态翻译学进行的绿色行为方式与绿色行为活动。将绿色翻译置于生态翻译学的语境中来考察其相关特征发现,共在性、共生性、和谐性奠定了绿色翻译的生态翻译学基础。绿色翻译具有本体意义上的和谐性,绿色翻译所内含的三个基本问题在生态翻译学视域下具体体现为:译者生存的境遇性问题、文本生命的生成性问题、翻译生态的交互性问题。基于生态翻译学的立场来考察绿色翻译的这三个问题,有利于译学界更好地理解与把握绿色翻译这种特殊的翻译实践活动,从而以整体论的方式推动翻译研究的发展。

关键词: 生态翻译学; 绿色翻译; 翻译研究

作者简介: 罗迪江, 郑州大学外国语与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 广西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生态翻译学的理论创新、国际化发展及数据库建设研究”(18BYY022);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西部地区项目“译者中心理论体系建构的生态理性研究”(19XJA740004);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一般课题“译论研究的中国叙事: 生态翻译学构成性特征及其学术定位研究”(21NDJC190YB)。

中图分类号: H059; X2 **文献标志码:** A **Doi:** 10.3969/j.issn.2095-042X.2021.04.0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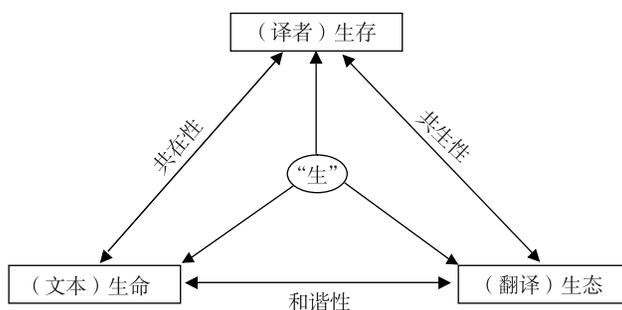
21世纪以来,生态翻译在国内翻译研究中的作用与地位越来越受到译学界的广泛关注与深入探讨。胡庚申的“生态翻译学”^[1]与许建忠的“翻译生态学”^[2]加速了国内学者对生态翻译的研究步伐,有些学者开始对生态翻译学与翻译生态学中所蕴含的“绿色翻译”理念进行思考与探讨,并试图对基于生态翻译学而建构的绿色翻译观进行尝试性论述与探讨。例如,李亚舒呼吁发展绿色翻译,认为“研究生态翻译,就是清除翻译垃圾,发展绿色翻译,发展全球背景下的生态翻译,为翻译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理据”^[3]。冯全功等指出,“绿色翻译体现了互文翻译观、诚信翻译观与和谐翻译观,提倡重复利用翻译资源,充分发挥译者的主体性与创造性,努力打造精品译文,从而实现不同的主体、文本与文化之间的和谐共存”^[4]。可以说,绿色翻译在生态翻译的实践活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作为生态翻译的具体化表征方式,它具有指导所探讨的绿色理念、绿色行为、绿色价值的思维潜能,为生态翻译提供了一个新的生长点。换言之,将绿色翻译应用于翻译实践具有明显的认知优势与生态潜能,以生态翻译学为基础建构的绿色翻译能够更好地理解与说明复杂多样的翻译现象,能充分地融合生态翻译学视域下的译者生存、文本生命与翻译生态,从而使绿色翻译具有复杂性思维范式的方法论特征。在此意义上,基于生态翻译学的立场,探讨绿色翻译在翻译研究中的本质特征和绿色理念,是生态翻译学发展的一种必然要求,也是当

代翻译研究的一种独特视角。

一、绿色翻译的思维范式

生态翻译学作为翻译研究的一种生态范式，“它致力于从生态视角去考察和理解翻译，并用生态术语概念去描述和表达对翻译的观察与理解，试图解除传统研究范式发展过程中被套上二元对立的枷锁，实现对翻译生态、译者生存与文本生命的整体性考察，顺应了翻译研究的整体性方法论要求”^[5]。生态翻译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话语体系等不同维度的转变共同引发了生态翻译学研究范式的转变。从整体上看，研究范式的转变意味着翻译思维范式与认知视角的转变，而且“一定范式指导下的翻译活动也折射出该范式对翻译研究‘应然’发展趋势的‘预示’”^[6]。综观语言学范式与生态翻译学范式的发展，其翻译视角可分为两大取向，即“文本视角”取向与“共生视角”取向。传统翻译（语言学范式）与生态翻译（生态范式）的研究视角分别代表了这两种取向，也昭示出这两种取向对翻译与翻译现象本质的理解。生态范式就是从“文本视角”的取向（文本取向）转向“共生视角”的取向（共生取向）。共生取向是指由译者生存、文本生命与翻译生态共同形成的绿色翻译。绿色翻译将共生视为翻译活动的内核。它意味着译者只有在共生中才能获得真正的发展，成为真实的生态人；文本生命只有在共生中才能生生不息；翻译生态只有在共生中才能新陈代谢。进而言之，绿色翻译是以译者、文本与翻译生态环境的“三位一体”为前提，倡导译者生存、文本生命与翻译生态“和谐共生”的理念，形成了“生存-生命-生态”思维范式。在此，“和谐共生”是指译者生存、文本生命与翻译生态相互作用、协同作用或相互整合而生成的生态关系。以“和谐共生”为理念的生态关系构成了绿色翻译的生命力，标志着翻译的绿色理念、绿色观念、绿色价值、绿色行为。以“生”为问题域凸显出强烈的生态理性、生命思维与生存意识，推动着翻译学者将思想的触角伸向翻译的“生态、生命、生存”之处，并试图从那里寻求翻译的本质与属性。它不仅包含翻译的生成性，而且还包含翻译的成长性^[7]。就此而言，绿色翻译与生态翻译具有内涵一致性与思想同源性。就不同内涵而言，生态翻译既是生态翻译学谋求翻译活动指向的基本目标，也是翻译研究警惕与克服翻译行为功利化倾向的基本理念，这是生态翻译学在认识论意义上的理论规范。绿色翻译是生态翻译在实践上与具体操作层面上的体现。它以绿色观念与绿色意识去实施翻译行为，在翻译实践中强调文本生命的可移植性、延续性、生成性、成长性。绿色翻译是生态翻译学在实践层面的映射，它不是对生态翻译学实践活动的简单说明与解释，也不是反映生态翻译学的模型或理论，因为它所展开的是翻译实践的绿色理念、绿色意识、绿色行为、绿色价值^[8]。在此意义上，绿色翻译涉及多重过程和多重层级的相互或联合作用。因此，“共生取向”所奠基的“绿色翻译”是把译者生存、文本生命、翻译生态的多重视角整合为一个综观的、整体的、复杂的、联合作用的“生存-生命-生态”思维范式。由此，绿色翻译的“生存-生命-生态”思维范式如图1所示。

综上所述，绿色翻译是将译者生存、文本生命、翻译生态作为整体原则来考虑



人类的翻译实践活动,其主要特点是把译者生存、文本生命、翻译生态视为一个整体,人类的翻译实践活动亦是由这些集合而成;与此同时,绿色翻译将“共生”而不是“文本”作为解释视角来说明与理解翻译。因此,绿色翻译的思维范式就是基于新的“共生取向”的生态范式,其本质上是以“生”为翻译内核实现译者生存、文本生命与翻译生态之间的融会贯通,从而揭示绿色翻译的共在性、共生性、和谐性。就此而言,绿色翻译的基本内涵包含三个方面:第一,译者生存是文本生命得以诞生与生成的前提条件。“生存”是我们思考一切超越性问题的逻辑原点^[9]。作为文本生命载体的译者的存在,是文本生命延伸与发展的基底。有了译者生存,才能凭借这个基底去探究文本的生命状态。因此,译者生存与文本生命是互生互存的,而共在性成为译者与文本之间的本质性关联。这是从译者的生存境遇来看待文本的生命状态,因为“译者凭其最大能力求得生存,求得发展,并获得‘选择’的自由,从而确保其在翻译活动中、在翻译过程中的‘中心’地位”^[10]。第二,译者生存与翻译生态是共生共存的,而且译者为了自身发展与文本生命的成长需要对翻译生态环境进行适应与建构。这就表明了“译者既是能动的、创造性的人,又是受动的、受限制的人”^[11]。一方面,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是为了能动地选择翻译策略进行具有绿色理念与绿色价值的翻译实践;另一方面,译者建构翻译生态环境是为了文本生命在新的翻译生态环境中得以“适者生存”“优者长存”,因为“文本召唤翻译就是召唤一种人类改造人居社会、完善群居社会的智慧”^[12]。第三,翻译生态是文本生命得以生成、生存、成长与发展的土壤,因而文本生命与翻译生态之间是和谐的。和谐存在于翻译活动的各主体之间,如译者与原作者、译者与读者、译者与翻译发起人、译者与编辑、出版商与读者、出版商与译文审查者、出版商与营销者、译品与版权人之间的和谐,以及上述翻译生态因子与翻译环境中诸要素之间的和谐^[13]。当然,在翻译实践过程中总会遭遇“生态失衡”的翻译行为,这就要求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承担生态翻译责任,践行绿色翻译思想,以“生态人”的理念去维护翻译生态的完整;并在翻译生态整体层面上要求译者树立绿色翻译观,倡导绿色翻译实践方式,警惕翻译行为的“生态失衡”与“异化”,进而克服与避免翻译行为的功利性与工具性。

由此可见,基于生态翻译学的绿色翻译涉及译者生存、文本生命与翻译生态的整合,对译者的生存境遇、文本的生命状态、翻译的生态整体的综观性审视,使得绿色翻译的“共生取向”有别于传统翻译的“文本取向”。译学界逐渐意识到,“文本取向”要么将翻译限制于狭窄的文本研究领域,要么放任其游荡于宽泛的文化研究之中。这使得翻译研究在理论综合上难以统一,长此以往,会导致语言学翻译观与文化翻译观之间争论不断,并引发关于翻译研究方向与前景、翻译主体、翻译重新定义等的一系列争论。这些争论在生态翻译学的兴起过程中得到整体性的认识与理解,使得翻译研究转向一种整体性的、复杂性的、生态性的思维范式。作为生态翻译具体化与实践化的绿色翻译,实现了从“文本”视角到“共生”视角的转变,从而能够更好地容纳生态翻译学进展中出现的新理论、新理念、新方法,并能够有效地解释翻译现象及其过程的绿色本质。“共生视角”下的译者生存、文本生命与翻译生态的相互关系是多重的、多元的、关联的与动态的。这是绿色翻译的生态关系与范式特征,它充分描绘出翻译研究的绿色理念、绿色观念、绿色价值。用绿色翻译的方法去认识和理解翻译就成为翻译研究新思维范式的必然选择,其完全合乎绿色翻译本身蕴含的绿色意识与生态责任。翻译本身就是具有相对生态化与绿色化的非线性复杂系统,可以通过“生存-生命-生态”思维范式进行适应性选择与选择性适应,这些适应选择活动在翻译过程中的联合运作带动了翻译整体的发展,其中蕴含了译者的生存境遇、文本的生命状态与翻译的生态整体。

二、绿色翻译的生态相关特征

绿色翻译必然涉及以“生”为主线的生态要素，在本质上是与“生存”“生命”“生态”相关的。绿色翻译储存着无限的和谐共生，蕴含着生存、生命、生态的意义，蕴含着共在性生存、共生性生命、和谐性生态的意义，促使绿色翻译迈向“生生不息”之境。翻译研究应该“仰望星空”（审视翻译生态），也应该“诗意生存”（关注译者生存），更应该“生生不息”（考察文本生命），从而建构一种具有共在性、共生性与和谐性的绿色翻译。因此，绿色翻译过程的实质是：对绿色翻译实践活动涉及的以“生”为主线的译者生存、文本生命、翻译生态之间的生态要素进行视域融合，然后在此基础上通过“生存-生命-生态”思维范式将这种融合关系呈现出来。在此过程中，“生存-生命-生态”思维范式是以“生”为主线，强调译者生存、文本生命、翻译生态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关联、协同发展，从而体现了绿色翻译的共在性、共生性、和谐性。

第一，绿色翻译的共在性。在绿色翻译视域下，译者生存、文本生命与翻译生态的共在，是译者与文本、译境之间的互生共存性，抑或互动互构的融合性。它使译者与文本、译境融合成一个不可分割的一体，表现为译者总是与文本、译境共在，总是生活在翻译共同体中。在这个共同体中，译者生存、文本生命与翻译生态相互依存、相得益彰、互生共存。其一，从译者生存的角度来说，共在是译者的基本规定，也是翻译的基本规定。人是一种自相关的存在，人的存在即生活，人选择生活就是选择存在方式，选择存在方式就是创作自身^[14]。从这个意义上说，译者是一种自相关的存在，译者的存在即翻译实践活动，译者选择翻译就是选择翻译的存在方式，而以“生”为导向的绿色翻译就是译者所选择的存在方式，也是译者在“生存-生命-生态”思维范式作用下创作了“绿色翻译”。其二，从翻译生态的角度来说，共在是翻译生态得以维持与发展的推动力，是翻译的生态整体得以体现的内在表征。翻译生态的复杂性与动态性就包含了在翻译实践中译者生存、文本生命与翻译生态之间的共在特性，对翻译生态所提出的是绿色翻译的共在的要求。此时，绿色翻译所关注的共在，是以“生”为导向的生存论意义上的共在，是具有绿色理念、绿色价值、绿色行为的共在，它将实现对翻译行为的功利性与工具性倾向的超越。在此意义上，绿色翻译就是为了译者生存、文本生命与翻译生态之间的共在。诚如张康之教授所言，“当人的共生共在的课题凸现出来，就必须超越利己还是利他的考量……理论探讨必须充分考虑到这个现实背景，必须根据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要求去重新审视利己主义与利他主义”^[15]。共生共在成为人类生存的基本主题，这也是一切行为和社会建构的基本原则^[16]。就翻译研究而言，共生共在成为绿色翻译的基本主题，也是翻译实践与翻译行为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其三，从文本生命的角度来说，文本生命诞生于、表现于和存活于生生不息的翻译生态之中，是译者的生存境遇与能动主体性在文本诞生、发展与延续之中的体现。离开译者生存与翻译生态的文本生命是不存在的。诚如陈东成所言，“翻译是一种孕育、培养和成就生命的活动，其过程可视为生命之旅。翻译的生命之旅，既有译作之生命之旅，又有翻译工作者，尤其是译作的生命之旅。文本经过翻译被赋予新的意义，从而获得新的生命，在异域传播”^[17]。

第二，绿色翻译的共生性。“共生”，指不同事物之间彼此相依相存组成一个共同系统^[18]。从绿色翻译的角度来看，“共生”的概念是在“译者生存、文本生命与翻译生态”的关系中得到说明与解释的。正是基于“译者生存、文本生命与翻译生态”的关系，“共生”意指基于“生存-生命-生态”思维范式整体性地看待译者与文本、译境之间的生态关系。换言之，绿色翻译的

共生性不再仅仅局限于语言转换的微观层面,而应扩展到译者生存、文本生命与翻译生态之间融合性的整体层面。从这个意义上说,绿色翻译基于一种“生存-生命-生态”的思维范式,内在地具有“自我与他者”(“译者生存、文本生命与翻译生态”)之间的共生关系。可以说,“翻译本质就是要在异中求同,在同中存异”^[19]。在绿色翻译实践过程中,当原有翻译规则束缚了翻译实践时,绿色翻译的任务就是突破现有思维的束缚,从而创造性地建构新的“生存-生命-生态”思维范式,正确处理自我与他者的共生关系,在共生关系中把握译者生存、文本生命与翻译生态的和谐关系。例如,当今语言学翻译观面临的问题是,在微观上表现为因过于狭窄的语言转换而产生的在复杂多变的翻译现象中难以解释翻译的复杂性;而文化翻译观的问题则表现为,在宏观层面上缺乏统一的研究议题,没有形成具有翻译本体特征的研究体系。简而言之,当前翻译观无论在微观上还是在宏观上,都难以解释翻译的共生性,而绿色翻译就是试图克服这些局限性,通过“生存-生命-生态”思维范式凸显译者生存、文本生命与翻译生态之间的共生关系。翻译中的共生关系终归是一种社会共生关系,一切翻译现象都应被当作客观事物对象去研究,当作社会存在的现象和本质去审视;译者应抛却“想当然”的主观意识,用翻译事实来解释翻译中的各种共生现象,进而把握翻译的共生本质和规律^[20]。在绿色翻译的视域下,译者生存、文本生命、翻译生态之间是相互关联着的,而这种关联让彼此构成了翻译的整体性与共生性。认识到这种互动关系的整体性与共生性,是我们更深刻理解译者生存、文本生命与翻译生态之间共生关系的认识论基础,也是理解绿色翻译的“生存-生命-生态”思维范式的方法论基础。

第三,绿色翻译的和谐性。绿色翻译本身就是一种关注译者与文本、译境之间和谐性的绿色理念,其基本指向就是文本生命的和谐共在,是生命共同体的和谐共生。绿色翻译的和谐共在、和谐共生使得文本的生命能够“适者生存”,在复杂多变的翻译生态环境中始终保持有序的结构。因此,绿色翻译的和谐性既要扬弃原文中心主义的观念,也要扬弃译文中心主义的观念,并基于“生存-生命-生态”思维范式实现译者生存、文本生命与翻译生态的融会贯通,从而开展具有绿色理念的翻译实践活动。和谐共在与和谐共生成为绿色翻译的基本主题。和谐性是绿色翻译的根本属性和根本特征。它成为绿色翻译的基本原则,也意味着译者与文本、译境之间有着协调的秩序。绿色翻译要求人们在译者生存、文本生命、翻译生态的“共生”语境下解答翻译问题,其生命力就在于它能够努力追求以“生存-生命-生态”思维范式来把握翻译的复杂本质,并尽可能为译者生存、文本生命与翻译生态的和谐性提供新的说明与理解方式。因此,和谐性不仅成为一种贯通和认识译者生存、文本生命、翻译生态的新方法论特征,而且被视为一种认识和理解绿色翻译的研究方式;不仅能揭示译者生存、文本生命与翻译生态的“共在”与“共生”法则,而且能把握绿色翻译的本质和其最基本的存在方式。由此可见,作为一种追求和谐性的绿色理念,绿色翻译能够展示翻译行为中译者的和谐生存本性以及翻译生态的整体和谐本性,而对于文本的生命状态来说还可以体现出文本的生生不息之势。因此,绿色翻译充分描绘出翻译的生态景观,给出了译者生存、文本生命、翻译生态之间相互关联、相互作用而构成了翻译生态系统有机存在的事实。用绿色翻译的方式去认识与理解翻译就成为翻译研究新思维范式的必然选择,其完全合乎绿色翻译本身蕴含的绿色意识与生态责任。

三、基于生态翻译学的绿色翻译

由上可知,绿色翻译是在以“生”为内核的共生共在状态下展开绿色行为,以和谐有序的形

式发展绿色方式，既试图克服语言学翻译观对译者主体性的遮蔽，又尝试克制文化翻译观对译者主体性的极度彰显。它是对传统翻译观对译者生存、文本生命与翻译生态关系遮蔽的反驳与匡正，展现了自身独特的共在性、共生性、和谐性。在绿色翻译过程中，译者生存、文本生命与翻译生态作为一个有机整体，译者与文本、译境是相互渗透、相互交融的和谐共生形态。正是对绿色翻译的以“生”为内核的相关特征的考察，奠定了绿色翻译的生态翻译学基础。绿色翻译是生态翻译的具体化与实践化形式，聚焦于翻译活动的绿色理念、绿色观念、绿色价值、绿色方式。因此，考察绿色翻译的生态意识与生命思想，必然以绿色翻译所内含的三个基本问题为切入点，即：其一，绿色翻译主体的生存问题；其二，绿色翻译文本的生命状态问题；其三，绿色翻译的生态整体问题。结合生态翻译学思维范式对翻译研究中的绿色翻译进行分析考察，从而说明绿色翻译主体的境遇性、文本的生成性、生态的交互性。

第一，绿色翻译主体的境遇性。“境遇性”就是“一种存在范畴的内容，即主体与被认知对象的存在关系”^[21]。在这种存在关系之中，“关系构成了存在之整体，亦构成了存在之个体。所以，存在即关系，关系即存在”^[22]。绿色翻译就是由译者生存、文本生命与翻译生态组成的存在关系。作为绿色翻译主体的译者时刻处于存在关系之中，这就需要译者既要适应翻译生态环境，又要建构新的翻译生态环境，使文本生命在新的翻译生态环境中获得持续的生命。就此而言，译者就不是仅仅在语言转换层面上被置于翻译生态环境之中，而是与文本生命、翻译生态相互融合构成了一种境遇性而非嵌入性的存在。境遇性存在就是译者的生存境遇，它是作为译者生存的构成部分与文本生命的诞生发展而存在的。从一开始，作为绿色翻译主体的译者就是境遇性的，浸没于翻译生态环境之中并与文本生命的诞生息息相关，互生互存。然而，自从翻译研究出现“语言学转向”以来，译者就自然而然地被打上了语言转换的印记而被视为“转换者”，而“文化转向”视域下的译者也就有意无意地被打上了文化语境的烙印而被视为“操纵者”“改写者”“叛逆者”“吞噬者”。21世纪初兴起的“生态翻译学”把译者置于翻译生态之中来审视其生态理性与生态行为，因而生态翻译学视域下的译者是作为“生态人”出场的。“译者作为‘生态人’而出场，其‘生态’不仅仅指关注译者的生存境遇，还要包括关注文本的生命状态与翻译的生态整体。因此，译者作为‘生态人’，其生态责任就是要在翻译实践中实现译者生存、文本生命与翻译生态的和谐关系。”^[23]作为“生态人”的译者只有从思想认识上有所改变，践行绿色行为方式，才能改变译者作为“转换者”“操纵者”“改写者”“叛逆者”“吞噬者”的身份。在此意义上说，绿色翻译主体作为“生态人”表征了文本对译者主体的依存性与译者主体对文本的境遇性，也意味着作为“生态人”的译者有责任与义务去协调翻译群落中的其他主体，使之形成翻译行为的协调者、引导者与推动者。一方面，绿色翻译是复杂多样的，基于生态翻译学的绿色翻译必定依赖于译者，而译者作为“生态人”出场，其着力点是“生态人”的绿色翻译活动，其思维范式就是符合绿色理念、绿色观念、绿色价值、绿色行为的实践方式。另一方面，译者作为绿色翻译的主体，由于受到文本生命与翻译生态的制约，需要在翻译实践过程中不断地做出适应性选择与选择性适应，由此也就形成了具有境遇性的“生态人”。绿色翻译的实质是译者作为“生态人”在“生存-生命-生态”思维范式作用下实现译者生存、文本生命与翻译生态之间的共生共在与和谐共生。换言之，译者作为“生态人”应该认识到绿色翻译主体的境遇性，而不只是关注从一个文本到另一个文本的语言转换；应该认识到译者作为“生态人”不仅要审视译者与文本的共在关系，而且要考察译者生存、文本生命与翻译生态的和谐共生关系。由此可见，基于生态翻译学的绿色翻译，本质上是一个具有境遇性的翻译实践过程，它具有很强的绿色理念与绿色观念，不仅体现

了翻译主体适应生态环境的外在需要,更体现了翻译主体创造绿色价值的内在取向。

第二,绿色翻译文本的生成性。传统翻译研究关于翻译的核心观点是强调语言转换的对等性,即从一种文本转换到另一种文本的一致性。于是,传统的翻译过程成为一种基于两种语言转换的行为方式,其对等性是根据原文与译文之间的一致性而判定的。这就使得翻译陷入了一种静态化与抽象化的泥潭之中。随着生态翻译学的兴起与发展,译学界逐渐开始认识到翻译的对等性难以涵盖复杂多变的翻译现象,难以从动态的、复杂的、生态的角度去审视翻译的复杂性本质。于是,生态翻译学将译者生存、文本生命与翻译生态视为其研究对象,建构起“生存-生命-生态”复杂性思维范式。这样,译者生存、文本生命与翻译生态交织在一起,互生共存,相互作用,在“生”的轨迹上获得了绿色翻译的生成性。绿色翻译的生成性决定了译者的翻译认知,决定了译者如何看待翻译之“生”与翻译之“成”;同时,也强调译者生存、文本生命与翻译生态三者共同构筑的绿色翻译的相生相映,以及三者各自在交互之中的生成与成长。无论就文本新生命的诞生、文本意义的理解与生成,还是就译本生命的传承与翻译的成长而言,翻译都是一个由生成性贯穿始终的复杂系统,在自我与他者关系的维度内不断寻求并拓展可为的空间;同时,翻译也是一个具有生成性本质特征的动态发展过程,以自身生命在时间上的延续、在空间上的拓展为根本诉求^[24]。在此意义上,生成性构成了绿色翻译视域下文本生命的根本属性与本质特征。若以传统翻译研究的文本中心论来解释翻译现象,则从根本上忽视了文本的生成性,硬生生地将译者生存、文本生命与翻译生态的和谐共生拆解与扭曲。

第三,绿色翻译生态的交互性。“翻译沟通两种语言、两种文化,它应建立并实现的是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双向交流与对话。无论沟通与对话,翻译都意味着在自我与他者之间建立联系,并促成各种关系的发生。”^[25]从生态翻译学的视角来看,绿色翻译就是在自我与他者之间建立和谐联系,并促成译者生存、文本生命与翻译生态形成动态交互关系与和谐交互关系。简而言之,绿色翻译的本质是动态交互的,它是基于译者生存、文本生命与翻译生态的相互作用、相互依赖、相互制约而生成的和谐关系。就翻译主体而言,译者不再是作为一个孤立被动的语言转换者出现,而是作为一个与文本、译境进行互动的“生态人”出现。这意味着,真正意义上的绿色翻译是在译者的生存境遇、文本的生命状态与翻译的生态整体之间的实时交互中涌现出绿色理念、绿色观念、绿色价值、绿色行为的建构过程,那种孤立的语言转换或文化操纵无法对这个过程进行充分描述。从文本生命的角度来看,文本的生命状态并非孤立地“在场”与“显现”,它只有与译者生存、翻译生态融合才能够得到生成性地、成长性地“在场”与“显现”,这也表明了文本生命与译者生存、翻译生态是动态交互而和谐共生的。从翻译生态的角度来看,翻译生态环境对于绿色翻译来说不是静态的、被动的、抽象的生态场,而是时时刻刻在与译者的生存境遇、文本的生命状态的交互过程中影响着作为“生态人”的译者的翻译行为的产生和发展的;反过来,译者作为“生态人”是嵌入翻译生态之中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塑造、建构了翻译生态环境的。因此,翻译生态与译者生存、文本生命不是相互对立而是相互依存的,是动态交互性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绿色翻译是在交互性中诞生又在交互性中成长的。翻译是在“间性”中诞生的,相关实体(包括主体)的“相遇”共同催生出了翻译^[26]。作为一种整体主义方法论,绿色翻译就是克服简单性思维范式,将翻译理解为一个由译者生存、文本生命与翻译生态相互作用而形成的和谐共生体,将翻译方法理解为一个整体性的“生存-生命-生态”思维范式。它以和谐共生为导向去理解与说明翻译现象,使翻译获得“生生不息”的阐释。

四、结语

翻译学的研究进路、研究重心一直在变化，但任何一次变化都不构成对已有范式的否定，而是对前人研究的补充和超越^[27]。绿色翻译是生态翻译学范式中一个新出现的研究议题，立足于生态翻译学的思维范式考察绿色翻译的本质特征，在翻译研究中具有无可替代的显著优势，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生态翻译学的发展，为语言学翻译观与文化翻译观之间的争论提供了一种新的融合力与整合点。其一，绿色翻译充分体现了翻译实践活动的共在性、共生性、和谐性，是对传统翻译思维范式的拓展与完善。其二，绿色翻译应该消解传统翻译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而致力于构建一种“生存-生命-生态”复杂性思维范式：它包含生存思维、生命思维与生态思维。因为存在生存思维，从而产生了作为适应性与能动性主体的译者；因为存在生命思维，既促使文本生命得以诞生、延续与发展，又促使翻译具有“适者生存”的生命力；因为存在生态思维，使得翻译生态、文本生命与译者生存互生共存，和谐统一^[28]。其三，绿色翻译的思维范式在翻译研究中具有整体性与复杂性，强调译者主体的境遇性、文本生命的生成性、翻译生态的交互性，从而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理解与说明翻译的复杂性思维范式，有助于揭示翻译的复杂性与多样化，并真正地促进了翻译学的发展。因此，绿色翻译是一种更整体、更具体的翻译观，“具有现实性、广泛性、具体性、历史性，是脱离抽象空洞的理论推演的具体实践运动”^[29]。它既为翻译学的发展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也为生态翻译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话语形态。总而言之，基于生态翻译学的绿色翻译，将作为翻译学领域内的一次思维范式的转换，推动翻译学朝着更加整体性和复杂性的方向发展，并逐渐成为当代翻译学的一种新思维范式。同时，随着绿色翻译研究的逐渐展开、成熟，生态翻译学的理论基础将获得进一步的深化与拓展，从而也将促使绿色翻译、生态翻译、复杂性思维在翻译学中获得更加完善的认识与理解。

参考文献：

- [1] 胡庚申. 生态翻译学解读 [J]. 中国翻译, 2008 (6): 11-15.
- [2] 许建忠. 翻译生态学 [M]. 北京: 中国三峡出版社, 2009.
- [3] 李亚舒. 共襄盛举:《翻译生态学》序 [M] //许建忠. 翻译生态学. 北京: 中国三峡出版社, 2009: 序 13-14.
- [4] 冯全功, 张慧玉. 绿色翻译: 内涵与表现 [J]. 山东外语教学, 2014 (1): 97-101.
- [5] 胡庚申. 翻译研究“生态范式”的理论建构 [J]. 中国翻译, 2019 (4): 24-33.
- [6] 蓝红军. 翻译学方法论基本概念: 范式与模式 [J]. 外语研究, 2015 (5): 72-77.
- [7] 罗迪江. 翻译研究中的问题域转换: 生态翻译学视角 [J]. 中国翻译, 2019 (4): 34-41.
- [8] 胡庚申, 罗迪江, 李素文. 适应“绿色发展”选择“绿色翻译”: 兼谈服务于生态文明建设的相应翻译专业设置 [J]. 上海翻译, 2020 (4): 46-51.
- [9] 张蓬. “生态文化”元理论问题检视 [J]. 江海学刊, 2003 (2): 46-49.
- [10] 胡庚申. 生态翻译学: 诠释与建构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3: 228.
- [11] 罗迪江. 生态翻译学视域下“译者中心”的客观意旨: 兼论“译者中心”面临的质疑 [J]. 外语学刊, 2019 (1): 92-96.
- [12] 汤富华. 翻译的澄明: 重思“诗歌不可译”论 [J]. 中国翻译, 2019 (4): 14-23.
- [13] 方梦之. 论翻译生态环境 [J]. 上海翻译, 2011 (1): 1-5.
- [14] 赵汀阳. 共在存在论: 人际与心际 [J]. 哲学研究, 2009 (8): 22-30.
- [15] 张康之. 为了人的共生共在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6: 12.
- [16] 向玉琼. 论人的共生共在视角中的人与自然关系: 有感于张康之教授《为了人的共生共在》 [J]. 东南学术, 2018 (2):

- 47-54.
- [17] 陈东成. 从《周易》的阴阳之道看翻译的生命之旅 [J]. 外语学刊, 2017 (6): 122-126.
- [18] 徐磊, 曹孟勤. 论和谐共生本体论建构: 理论与实践的合理复归 [J]. 自然辩证法研究, 2019 (2): 125-129.
- [19] 许钧. 当下翻译研究中值得思考的几个问题 [J]. 当代外语研究, 2017 (3): 1-5.
- [20] 刘满芸. 共生理论视阈下的翻译研究 [J]. 中国翻译, 2016 (3): 20-25.
- [21] 吕俊. 开展翻译学的复杂性研究: 一个译学研究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的革命 [J]. 上海翻译, 2013 (1): 1-6.
- [22] 唐代兴. 生态理性哲学导论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24.
- [23] 罗迪江. 译者研究的问题转换与生态定位: 生态翻译学视角 [J]. 中国翻译, 2020 (5): 13-19.
- [24] 刘云虹. 试论文学翻译的生成性 [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17 (4): 608-618.
- [25] 刘云虹. 翻译定位与翻译成长性: 中国文学外译语境下的多元系统论再思考 [J]. 外国语, 2018 (4): 94-100.
- [26] 冯全功. 从实体到关系: 翻译研究的“间性”探析 [J]. 当代外语研究, 2012 (1): 48-52.
- [27] 蓝红军. 从学科自觉到理论建构: 中国译学理论研究 (1987—2017) [J]. 中国翻译, 2018 (1): 7-16.
- [28] 罗迪江. 生态翻译学复杂性思想的复杂适应系统阐释 [J]. 山东外语教学, 2021 (3): 98-107.
- [29] 宗海勇. 马克思主义关于自然生态与社会生态的同一性与张力论纲 [J]. 常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 22 (3): 101-107.

On Green Transl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Translatology

Luo Dijiang

Abstract: Green translation is a representative form of eco-translation practice by means of combining green methods and green ideas universally existing in eco-translation. Its essence is a way of green behaviors and an activity of green behaviors based on Eco-Translatology. The relevant features including coexistence, symbiosis and harmony in green translation are examined in the context of Eco-Translatology and these three features lay an Eco-Translatological foundation for green translation. In ontological sense, green translation is of harmony and its inner three basic problems are represented as follows: the situationality of translator survival, the generativity of text life and interactivity of translation ecosphe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Translatology to examine these three problems, it contributes to having a better understanding and grasping of green translation as a special activity of translation practice, which can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ranslation studies in a holistic way.

Keywords: Eco-Translatology; green translation; translation studies

(收稿日期: 2021-03-30; 责任编辑: 陈鸿)